



为“全民阅读”补上一曲民风中华诵



世界上唯一能穿越时空的，是人的思想。所以，对先贤思想的尊重，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

此心光明

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

汪高鑫
李德锋◎著

公元15世纪中叶，上苍同时点化了两个政治天才：一个是亚平宁人马基雅维利，一个是中国浙人王阳明。马基雅维利以霸术思想见诸《君王论》，引发整个欧洲政坛巨大震动；王阳明以心学理论著述《传习录》，突显文治武功的治国方略，然而明朝的中国却错过了王阳明。



人民教育出版社

此心光明

——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

汪高鑫
李德锋 /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逸
封面设计：尚书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心光明：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 / 汪高鑫，李德锋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国学书厢)
ISBN 978-7-01-011772-0

I. ①此… II. ①汪… ②李… III. ①心学—中国—
明代②《传习录》—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278号



此心光明——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

CIXIN GUANGMING — PINGSHUO WANGYANGMING YU CHUANXILU

汪高鑫 李德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35千字

ISBN 978-7-01-011772-0 定价：46.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国学书厢》序

汪高鑫

所谓“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最高一级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概到20世纪初年，“国学”一词完成了语义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代名词。这种语义转换的背景，则是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转型。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国学”一词，以与“新学”、“外学”相对举，彰显中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的区别。此后学者多以“国学”代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邓实就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胡适也说，国学是“中国的一切过去历史与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博大精深。因此，这门“国学”的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历史上自然是独一无二的。按照我们先人的划分方法，它包含了经、史、子、集四大系列。具体而言，这门“国学”以先秦六经与诸子学为基础，包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二十四史、历代野史杂史，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医学、兵法、农学、书画、星相、算术等等众多学术门类。而“国学”的核心，则无疑是传统儒学。

“国学书厢”系列丛书的推出，便是要通过对国学中有影响的各类传世典籍作出有所选取的评说，以期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风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精髓。之所以“有所选取”，是因为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任何一种系列丛书，都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的评说。本丛书的选取对象，主要是以秦汉以后诸子、杂史、文论等经典作品为主。作出这样的选取，是基于相比较于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和二十四史等国学“大众经典”而言，秦汉以后的诸子、杂史、文论等相当数量的国学经典，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熟知，目前尚属于“小众经典”。然而这些国学典籍评说人性善恶、纵论文韬武略、参透历史玄机、洞悉政治内幕、语录警世箴言，其学术与思想价值毫不逊色于“大众经典”，它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学术上自成“一家言”，思想上启迪后人。

编辑这套国学经典评说丛书的用意至少有两个，其一是为大众了解、学习国学经典提供方便。随着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通过学术讲堂与图书出版等多种形式，国人对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二十四史等国学典籍多少已有所了解。然而这些典籍虽然浩繁，却只是国学典籍中的一部分。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两千年历史中，历代都有数量众多的诸子、杂史、文

论等经典问世，它们也是中国国学典籍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它们相对还比较陌生。展开对这些国学经典的系统评说，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了解这部分国学经典，汲取其带给我们的思想素养和精神力量，力求使这类“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

其二是为中国的文化总结与传承工作尽一份力量。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国学经典就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珍贵品”，是一份中华民族的厚重的遗产，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自当倍加珍惜，认真总结，努力传承。评说国学经典，便是一种文化整理与总结工作；而整理与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下去，使中华文化得以川流不息。

基于这样的目的，该丛书在国学经典评说方法上力求做到两点：第一是准确性。国学经典评说不是戏说，而是一项严肃认真的文化总结工作，因此，必须坚持准确性原则，尊重经典原意，阐释经典精神。为了帮助读者准确领会经典，该丛书的编纂体例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论相当于一个整体性的导读，集中介绍作者生平与学术，以及所评说经典作品的学术

价值，旨在使读者对经典价值及其作者学术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文则以解读和阐释经典内容和思想为主线，并将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学术实践过程、思想发展脉络融入其中，以期全面展现经典的思想价值和作者在思想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魅力。

第二是通俗性。该丛书编纂的努力方向是使“小众经典”最终成为大众读物，既然要成为大众读物，当然其主要读者群体是非学术专业的普通大众读者。而要让大众读得懂国学经典，了解经典的学术思想，就应该摒弃学术文体与学术语言形式，努力贯彻通俗性原则。为此，该丛书的经典评说，力争做到内容上深入浅出、语言上通俗易懂，以期激发起大众读者的经典阅读兴趣。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学书厢丛书”，可谓眼光独到、立意新颖。相信随着经典评说系列丛书的不断推出，会激发起大众读者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这将对传承国学、汲取民族文化素养大有裨益。

2013年11月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园

导 言

王阳明（1472—1529），初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县人。官至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隆庆元年（1567），追赠新建侯，谥文成。因曾结庐苦读于家乡附近阳明洞，故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阳明生前武功文事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平定宸濠之乱，对于明代中期政治的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所建立的心学体系（又称王学、阳明学），对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展有突出贡献，为明朝中后期的一大显学，对后世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王阳明其人及其学术大概。

一 王阳明其人、其学

——**家族背景** 王阳明的家族可以说声名显赫，名人辈出。晋朝时先祖王览官至光禄大夫，他的曾孙更是了得，乃声名显赫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①。也就是从王羲之开始，王氏家族从琅琊徙居山阴，其后王阳明二十三世祖迪功郎王寿又自山阴徙往余姚，王氏自此于余姚定居下来。因此，我们一般称阳明家族为余姚王氏。王氏家族进入明代以来，更是能人辈出，卓有功勋。王寿五世孙王纲为文武兼才，明初为刘伯温荐举做了兵部郎中，后

①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王阳明并非王羲之嫡系后裔，而只是与王羲之有宗亲关系。此乃采用学术界传统的主流观点。

又升为广东参议，在平定苗民之乱中战死。与明朝前期发展重心由武功向文治转移的背景一致，王氏家族也呈现出这样的色彩。阳明高祖王与准，精通《礼》、《易》，撰有《易微》一书，朝廷曾以遗逸荐举，但他比较有个性，回绝了朝廷的美意。曾祖王世杰以明经入太学，谥封新建伯。他的祖父王伦胸次洒落，能歌善吟，时人喻之陶靖节、林和靖，所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封翰林院修撰，追封新建伯。其父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晚称海日翁，因曾读书于龙泉山中，又称龙泉公，成化辛丑进士及第第一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进封新建伯。正是在王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为世务所累、洒脱的家族性格熏陶下，培养了王阳明天资聪颖和豪迈不羁的性格。

——天资聪颖 豪迈不羁 阳明在孩提时，便充满了传奇色彩。相传阳明的母亲郑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下他。而在阳明出生前，其祖母岑太夫人曾经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故阳明出生后，其祖父王伦便为这个新生孙儿取名为云，这便是“云中送儿”典故的由来。阳明出生后，5岁才能说话，却出口即诵祖父所曾读过之文，11岁赋诗即能对答自如，这都展现了阳明天资聪颖的秉性。有时候这种性格又表现出“狂”的一面，阳明15岁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不仅留意考察战备，而且与胡人交锋。后闻石英、王勇、石和尚、刘千斤为乱，几次想向朝廷献策，其父斥之为狂，终作罢。这种性格也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阳明17岁大婚之日即游铁柱宫，向一道士讨习养生之术，至

明早始回还家里。阳明早期对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怀疑以及其后的突破，针锋相对地提出其心学命题，除其思索体悟等努力外，其天资聪颖、好学深思、豪迈不羁的性格，毋庸置疑也赋予了其额外的勇气。

——追寻程朱的年代 不管早期的阳明如何具备了突破程朱理学的诸多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学术生涯还是以追寻程朱为起点的。因为其时作为一名学子接受教育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科举应试，而科举考试的内容主干就是经过程朱理学解释过后的儒家经典，因此，从阳明的蒙学阶段为始，程朱学说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他的视野。早在其12岁时，阳明在与其塾师的对话中就已经阐明科举登第并不是天下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当为做圣贤的鲜明主张。“圣贤”一词在阳明的话语体系中是非常丰富的，而这里的“圣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与程朱理学画上等号。因为在弘治二年，也就是阳明17岁时，他曾拜访当时著名的朱学代表娄谅，娄谅向其讲授宋儒的格物之学，认为如此可以做得圣贤，致得圣学。阳明也对此非常认同。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所谓的“圣贤”、“圣学”的内涵，即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及其学说。在具体的为学路径上，阳明也充分借鉴了程朱学说的相关理论。就在阳明向娄谅请教的次年，他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洒脱随意转向严肃端庄，这显然与吸收了朱熹居敬持正的读书致知路数有关系。其后在科举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无不说明程朱学说对青年阳明的成功塑造。就时间跨度而言，阳明早期为学

的这一阶段，直至其龙场悟道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和学术自信，才宣告结束。

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的是：就阳明追寻程朱时代的学术内涵而言，它同样包含着对于程朱的怀疑，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按照朱子格物致知说所进行的“庭前格竹”的著名典故。阳明以深信不疑的宋儒格物之说为理据，对着庭前的竹子反复思索，希望获得真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思索之后，没有获得任何收获，也没有取得思想上的升华，反而却因此而染上了重病。由此，他开始对通过研习程朱学说以达到成圣成贤的途径产生了怀疑，进而采取了消极的人生态度，主要表现为消极避世和随波逐流，如接触佛老思想和抛弃成圣信念，把以前不屑为之的辞章之学作为研读的重点。就这一阶段阳明的格物致知的求学探索经历，特别是因失败转而出入佛老的经历而言，都对其后来心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出入佛老 在阳明企望通过对程朱等宋儒诸说研习以达到其成圣成贤的愿望破灭之后，“辞章”和“骑射”之学确实分散了其一部分精力，但他每每更多地把精力用于研习佛、老，特别是道家学说。²⁷岁时，对程朱学说仍抱有些许希望的阳明，一日看到朱熹“居敬持志”的读书之道，就此反思以往沉溺于辞章之学的种种不妥，于是按照朱熹所言去做，虽然有所收获，但终不能达到其所希望的圆融贯通境界，从而导致其“庭前格竹”失败后的又一次大的心理挫折，这时阳明寻求心理解脱的依靠就

是道家养生之术。道家成为此一时期阳明的心理慰藉。其后利用游九华山之机拜谒道者陈蓬头，请教地藏洞异人，于阳明洞中行导引之术并有所得。平心而论，佛、道思想确实对阳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便是在其晚年建立心学的体系之后。如在其52岁时，仍然认为士人所谓佛、道的内容，本身都是儒家所具有的，只是后儒自我“约束”了自己，让出了这些领域，本来这些都可以统摄于儒家理论体系下的。对于佛、道，阳明表现出较为柔和的态度，并非像时人简单地斥之为“外道”、“异端”。而且在阳明传播自己的心学理论中，面对世儒关于佛、老与儒家的纷纷扰扰，佛、老问题一直存在于阳明的话语体系中。但又不可否认的是：阳明后来又摆脱了佛老的羁绊，而且这一过程是在“龙场悟道”之前两年，即31岁时。至于弃去佛老的原因，《年谱》载有两条：浪费精力和扭曲人性，即所谓“簸弄精神”和“断灭种性”。其后，阳明在各种场合把其所悟付与实践。同年，成功劝服一禅僧放弃修炼，回家探望母亲。次年，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提出了“老佛害道”的命题。这都说明阳明又产生了“用世”的念头，重新返归于“圣学”所规定的既有内容。而这次回归给阳明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更大的挑战，当然也使得他没有回到程朱学说这一出发原点，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龙场悟道 龙场顿悟在阳明心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的初步建立。考察龙场顿悟产生的原因，其中既有龙场非人的肉体和精神磨难，也有阳明豪迈不羁

的性格，以及追随程朱的失败，和出入佛老的亲身经历等。通观《年谱》所载，寥寥数语，颇有神秘色彩。其实龙场顿悟所悟之“道”，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内涵而言，这一思想早在其15岁练字的经历中就已经开启其端了。阳明认为“心”本身就包含着练好字的天然属性，只要把此“心”本就具备的这一能力发挥出来即可。这说明龙场顿悟的经历在阳明心学发展史上固然非常重要，但其理论渊源有自，我们切不可把阳明“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或“犹如天授”的得道欣喜，仅仅理解为阳明学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口实。当然，也毋庸讳言，关于龙场悟道的具体内容，我们也确实需要一定的梳理才能完整确定。大致看来，其内涵基本包含“心即理”和“知行合一”两大命题。“吾性自足”及“心即理”，都表达了心体存在的第一性。“知行合一”命题是阳明在龙场顿悟的次年提出的，并以此教学。当然这一命题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心即理”心学这一基本命题基础之上的，即阳明所说的向我们的心求得圣人之理，它本身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龙场顿悟前后，阳明提出了自己心学体系三大命题中的两大命题，其学说一经提出，开人耳目，门徒益进，当然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各方的辩难。

——学说流布、挫折及其发展 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便以倡明圣学为事，即开始有门徒跟随。赴龙场路上，也是随地讲授。龙场得道后次年，以知行合一之教折服提学副使席书与当地诸生，并入主贵阳书院讲学，不仅获得了一定数量的

拥趸，而且有了固定的讲习场所，这都为阳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赴任庐陵途中，又教门人习以静坐之法。正德五年（1510）入京，后军都督府都事黄绾对其学说非常信服。之后门徒日进，据《年谱》记载，正德八年（1513），他在安徽滁州督马政时，门人就已经达到数百人的规模，这也说明阳明门派已经初具了规模。其后，阳明执政江西，随着学说的精进和政治威望的提高，阳明学派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和发展。不仅培养了信奉阳明心学并以宣扬师说为己任的一批骨干，如邹守益、欧阳德、刘邦采等人，而且代表其学说的各种著作也得以刊行传布，如《朱子晚年定论》、《古本大学》、《传习录》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阳明基于学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与门生的往复探讨中，也相应促进了自己的认识，从而使其理论更为丰满和圆通。如在其弟子徐爱的追问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这一命题，并在多处采取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反命题，来进一步表达其“吾性自足”的丰富内涵。又如论朱陆之争，也是在门生王與庵和徐成之的争辩不下的情况下，迫使阳明提出自己看似居中调和实际却是表彰陆学的见解，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其心学思想源自象山之学。特别是在评价朱子学的过程中，阳明广泛使用“心”、“尊德性”等主体范畴，这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朱子学公然挑战的态势。可见，在与诸生的讨论中，阳明对于如何悟得本心的途径是不断思考的，当然其中也多有反复，这都促进了阳明学的发展。

在阳明心学的流布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种种窘境，特别是关乎工夫论一节。

正德五年，阳明由龙场赴庐陵任上，遇到昔日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人，向他们诉说自己在贵阳发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为时人理解，引起了认识上的模糊很有悔意，从而对此说提出了修正，认为可以通过静坐方法悟得心之本体。既而又认为静坐之方容易让人把此与佛教禅宗入定等同起来，故又寄书澄清：静坐只是因为晚辈在生活中为杂事烦扰，不知如何悟得本心，而采取的一种权宜的方法。同年十二月，在与门生黄绾、应良论工夫的过程中，阳明的态度就明显坚决和硬气了很多。认为心体分为圣人和常人，圣人自不必言，常人心体则往往为杂念侵蚀，这就需要一番外在的修炼。甚至我们可以说，虽然阳明较早地提出了“心即理”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命题，但这一关乎其工夫论上的问题一直等到其“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才大致算告一段落。

——致良知 在阳明于50岁（一说49岁）时提出“致良知”的命题前，其生活基本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内容：一是忙于自身学说的构建和学派的发展；一是投身于仕途，处理政务。同时，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交叉的。如前已提及，阳明在江西时是阳明学派发展的突出时期，这正是利用了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所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得阳明成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代表，这无疑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发展。不仅如此，平定宸濠之乱还对阳明“致良知”一说的产生发生

了直接的作用。首先来看一下平定宸濠之乱的原委。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宸濠在江西南昌叛乱，向明朝的留都南京进军，企图取代武宗皇帝，对明朝统治的延续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阳明时在江西丰城，由于事起仓促，未在明廷授权下即组织“义兵”讨伐宁王，短短10天之内战局即告结束。但由于武帝的昏庸和王彬的图谋不轨，围绕这一事件的政治机谋依然密布，当然首功之臣王阳明也是危险重重，但最终都得以化险为夷。也就是在经历宸濠之变及其后的政治动荡后，阳明提出了其心学体系的第三个基本命题：致良知。阳明对此非常重视，认为是其学说的最终归宿。

通观阳明“致良知”的内涵，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何为良知？良知如何致得？前者属于本体论范畴，后者属于工夫论范畴。关乎前者，王阳明良知说在孟子良知即为道德良心这一伦理学的基础上，强调了良知是心之本体、良知是理等本体论上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致良知”主要的贡献在其工夫论上，这也是阳明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后，紧接着就表达“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落实用功，负此知耳”的担心所在。阳明一方面主张把吾心本具之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则事物之理自现。一方面也认为良知是当下的即刻存在，时刻存于现实实物中，因此也有必要“随时就事上”去做致良知功夫。更由于常人不能保持住这一自然良知，因此就更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现实修为去致得良知，从而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但就“致良知”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本体论和工夫论内涵，虽然在阳明这里得到了

疏通，但在门人和后学那里却一直是一个争论最多的话题。

——天泉证道 嘉靖六年（1527），阳明奉命将要征讨思恩、田州的前夕，两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针对阳明晚年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所谓“四句教法”来讨论为学宗旨。王畿认为在阳明心意知物本是一贯的前提下，既然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意、知、物三者的属性也应是无善无恶的；钱德洪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虽然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但此本性往往为习性所遮掩，落在意上则为有善有恶，因此需要“为善去恶”，才能恢复它本来无善无恶的状态。两者相争不能决，请教于阳明。于是，师徒三人在天桥上进行了问答，史称“天泉证道”。“天泉证道”所包含的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探讨了“心体”与“性体”、“无善”与“至善”等范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本体论和工夫论的问题。表面上看，阳明对于王畿和钱德洪的争执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态度，认为王畿和钱德洪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其实相互之间应该借鉴，而不是排斥。承认自己“教法”原有两种，对于秉性较高的，往往鼓励他们随心所欲，直悟本源；对于普通人而言，则要在事物上磨炼，慢慢积累。而秉性较高者显然在普通人之上。由此，我们暂且不论在本体论上王畿的主张与阳明“良知自足”说更为契合，得到阳明的认可。即使就工夫论上，阳明也较赞成王畿之论，而视钱德洪所主张的磨炼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虽